

# 微博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对浙江大学学生的调查\*

季程远 郎友兴

**摘要：**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兴起以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当前政治参与渠道的制度供给限制，微博成为最大的舆情源头，线上抗议逐渐向线下现实行动过渡。研究微博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针对性的治理。通过对浙江大学408名学生的调查分析，提供了否定悲观主义者对互联网在提高政治参与中积极意义的证据。政治兴趣是政治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政治效能感和社会网络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该机制模型对于线下政治参与和线上政治参与同样适用，且对后者的解释能力是前者的2.66倍。

**关键词：**政治参与 微博 作用机制

当前政治参与渠道提高了政府的控制力，但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表达的需要。制度供给之外，互联网因其开放性、反控制、匿名性、互动性等特点，愈来愈成为一种重要并且具有特殊意味的表达渠道。对微博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能够对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微博有所帮助。对于大学生来说，网络是为数不多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因此异常活跃，“欲知明日之社会，且看今日之校园”。青年时代可以影响终生，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

\* 本文受浙江大学研究生求是学社2013年立项课题资助（项目负责人：季程远），项目编号（QSKT1314）。衷心感谢张妍、张彩霞、杨敏敏和杨名等同学对问卷调查所作出的贡献。

## 一、绪论

研究互联网和政治的关联性最早始于国外的法学学者（如 Johnson & Post, 1995）。当互联网逐渐成为连接国家甚至世界的载体，法学家们开始思考传统法律在这一新场域中的适用性问题，之后甚至作家都有相关的讨论，然而，较有意思的是，政治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却不多，其作用也不突出。尽管帕特南（2001）和斯考切波（2004）在讨论美国公民政治参与下降的过程中重点阐述了大众媒体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作为新兴的政治参与形式的互联网，着墨并不多。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的拓展，互联网逐渐介入到美国选举政治生活，并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在著名的茶党组建和奥巴马竞选获得的创纪录的小额资金支持后，互联网和政治的距离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被大幅拉近，这种组织形式的剧烈变革，成为一大研究热点。之后，著名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成为焦点。这些社会化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以及之后的“英国青年骚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抗议运动的组织和抗议规模的转化中，其机制和未来可能的作用尤其重要。基于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等工具产生的多元公共空间，可能与当年报纸在法国大革命前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大众传媒屡次声称微博是众多抗议事件的诱因，甚至“推特革命”一再提及。但也有研究表明媒体的不可靠，微博的力量被高估了。比较研究的文献中，互联网如何塑造民主政治有了更多讨论。

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山鼻祖芒福德在 1964 年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技术带来的是集权抑或民主。针对互联网带来的影响，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样流行，乐观者：互联网带来权力的分散和直接民主的复兴；悲观者：无政府状态泛滥或者政治控制进一步加强。公共知识分子等是前者最突出的支持者，后者则已经被“棱镜门”事件证实，并不是杞人忧天。赵鼎新教授对中国网络作了系统而精心的观察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微博的特色在于网民更有可能和更容易被操纵。这种反思性的研究很重要，却

很容易淹没在微博带来的话语浪潮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民主的复兴。

中国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主要有：（1）人大、政协、党内参政议政活动；（2）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中的党支部；（3）吸纳社会精英（私营企业主）入党；（4）信访制度。（5）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听证会、开放式会议以及其他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活动和行为；（6）基层社区和乡镇开展的公民选举和自治活动。<sup>[1]</sup>其主要特征为执政党领导之下的统合型的政治参与，主要是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立意的偏离，使得一些问题凸显：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参与的形式化和仪式化以及民众参与冷淡；制度供给不足直接导致参与范围的狭窄，从而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参与制度之外，使得对官僚政治的监督不到位，进而导致腐败和国家治理的低效；现行法律和相关制度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大都不清晰，因而缺乏程序性和可操作性。

正如帕特南和斯考切波不经意地提到互联网一样，民主政体中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更快的信息传播平台，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但翻开中国互联网的历史，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影随形。1999年人民网“抗议论坛”（后改为“强国论坛”）作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出口是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起点，到2003年以“孙志刚案”为代表的系列事件被《中国新闻周刊》称为“新民权运动”，2009年网络参政向现实行动的标志性事件——“邓玉娇案”，直接导致当地政府封锁港口以阻止涌入的网民后援团。仍然是2009年，新浪微博内测，微博进入主流人群视野，据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0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微博仅用数月就成为继新闻报道、论坛爆料后的第三大网络舆情源头。人们无需在不同网站转换，跟踪多个信息源，微博成为最大的议政广场，加上微博本身的互动性特征，突发事件的传播效率出现了惊人增长，网民政治参与更趋大众化，从动员式参与向自主参与、从松散的个人参与向组织化参与、从孤立的参与向横向联系发展。网民压力下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出现戏剧化的逆转情节。政务微博的大量进入，使得微博作为非制度参与的渠道进一步拓展。转型期的中国，

社会矛盾的增加和激化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频繁发生。根据亨廷顿的著名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 = 政治不稳定，一国的政治参与必须与本国的制度化水平相适应。那么目前我国较低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与非制度化参与过度，极易酿成社会不稳定。

以上是本研究立足的现实因素，互联网时代微博的崛起需要对背后的机制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事实上，从文献的脉络看，机制研究显然是相当不充分的。

研究媒体的学者倒是较早地讨论了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可能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动员效应（Expansionary Perspective）。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人人都可以通过它表达和交换观点。Norris（2000）就认为如果这些信息（人们的观点）能到达一些有潜力的人群，如青年人，那么他们的政治参与就会扩大。<sup>[2]</sup>第二，增强效应（Reinforcement Perspective）。由于数字鸿沟等因素，Di Gennaro 和 Dutton（2006）认为动员效应并未实现。<sup>[3]</sup>互联网会强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差距，网上参与到政治中的人是那些本身拥有更多参与资源的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是起补充而不是替代作用。总体上，随着实证研究的推进，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在增加。学者们也力图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验证动员效应。

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鉴传统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唐斯的“理性选择模型”、“社会经济地位模型（SES 模型）”以及“资源模型”，维巴（Sidney Verba, 1995）等提出的“公民志愿模式”（Civic Voluntarism Model）整合了这些理论并纳入了心理因素，“公民志愿模式”认为政治参与行为是公众的政治卷入（兴趣和动机）、社会网络和参与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sup>[4]</sup>维巴总结的“公民志愿模式”包括三大因素：资源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资源因素主要是时间、金钱和参与技能，心理因素主要是政治效能感、公民价值观、群体意识，环境因素主要是制度等。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会存在显著的不同，Krueger（2002）就举例认为人们需要新的网络技能。<sup>[5]</sup>Krueger（2006）进一步指出，一些存在已

久的决定因素不能预测线上参与，政治兴趣和网络技能因素则仍然可以。<sup>[6]</sup>陈强和徐晓林（2012）对国外文献的综述性研究，从社会资本、政治效能和政治兴趣三个方面归纳西方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sup>[7]</sup>但遗憾的是，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对新的变量感兴趣，常常把众多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而不是探求在同类研究中存在的并一直具有解释力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作用机制，而中介作用、调节作用的研究也非常稀少，一些理论上的重要变量不显著的情况没有进行处理。

综合已有文献的缺失和现实的需要，本研究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收集经验数据，作一探索性研究。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对象的合理性问题，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历次互联网报告，截止到2013年6月，学生群体占比26.8%，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30岁以下网民占54%，大专以上网民占20.3%，同时根据2010年《中国互联网白皮书》，大专及以上人群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0%以上。因而，把青年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既合理也具有前瞻性。

## 二、研究假设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个体的社会互动能够获取相应的资源，互联网的使用被普遍认为能够拓展个人的“弱关系”，而个体的弱关系将促进个体对多元化观念的接触与理解，有利于个体在线社会资本的累积。社会网络规模及其异质性将促进讨论，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发表意见，而这正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这种互动的良性循环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产生和持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

政治效能感包括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内部效能感指对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并有效参与政治的信念，外部政治效能则指对政府机构和官员回应公民需求的信念。经验研究已一再证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正向关系。个体自我感知的政治知识、能力、所能调动资源的能力可以影响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所感知的外部的回应程度则从另一方面会产生对

参与积极性的影响，不过两者都为正向。

政治兴趣是解释众多政治现象的关键变量，可以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的动机，对于政治参与，政治兴趣强的人，显然更可能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一：个人的政治兴趣越强，政治效能感越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越可能进行政治参与。

互联网拥有开放性、反控制、低成本、匿名性、互动性等特性<sup>[8]</sup>，一方面，开放性、低成本使得个体获取信息的成本变得几乎为零，更知情的公众更易参与政治。同时，这两种特性也意味着过去的集中协调和等级制度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中可以用更为宽松的协调方式取而代之，这将使集体行动变得更为容易。笔者认为这种潜在收益将推动这种协调方式的拓展与渗透，使得协调的规模更为巨大，这也符合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互动性特征使得个体的社会网络得到拓展，更易与政治参与更多的人产生讨论和互动，另一方面，匿名性等特征弱化了戈夫曼所说的个体的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的区隔，使得个体的后台行为前台化<sup>[9]</sup>，或是 Henry Farrell (2012) 所说的降低偏好伪装的因果机制<sup>[10]</sup>，对于隐瞒真实偏好的冲动在互联网上将得到缓解，更加乐于表达，甚至极端化，例如网络泄愤事件等，产生网络政治参与。微博此类社会化媒体，不仅拥有互联网的全部特征，且这些特征更加突出，社会化媒体本身就具有互动性、反控制起家。

但这却是一个仍有争论的问题，Polat (2005) 注意到个体在处理信息时能力有限，并指出，主动寻找政治信息的个体本身就属于政治参与水平较高的群体，所以政治兴趣而非互联网影响了政治参与。<sup>[11]</sup>之前，Negroponte (1995) 就指出了互联网对于社会影响的悲观前景，互联网会导致一个更缺乏凝聚力的社会，个人会停止从报纸和电视获取信息而转向更加私人的信息渠道，这可以被称作“每天的我” (daily me)<sup>[12]</sup>。这也正是 Henry Farrell (2012) 谈到的同质分类 (homophilous sorting, 即志趣相投) 的因果机制，互联网拓展了可以搜索到的可供进行特殊兴趣交流的人数，集

体行动更易产生和扩大。帕特南(2001)的观点也很类似,他以电视这种大众媒体为例,分析后指出,它将我们的闲暇时光“私人化”的同时,也将我们的公共活动私人化了,对我们相互之间交流的抑制比对个人政治活动的抑制更甚。<sup>[13]</sup>换言之,大众媒体通过抑制个体的交流,阻碍了个体的公共参与。笔者认为,对于国外公众而言,互联网及社会化媒体只是政治参与可能的一种渠道,但对于处在中国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中的公众而言,互联网及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非制度化参与的重要渠道,在实践中已爆发惊人能量,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线上政治参与高于线下政治参与。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二:微博用户线上政治参与比非微博用户更多,线上政治参与比线下政治参与更多。**

相关实证研究中已经确认了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对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张明新,2011;Ellen Quintelier等)<sup>[14][15]</sup>,但对于这些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目前为止,少有人从实证层面进行探究,Gil de Zúñiga H.(2012)探究了社交网络(SNS)服务中新闻服务和社会资本对于公共参与的影响,并绘制了结构方程模型图。<sup>[16]</sup>笔者考虑构建了如图1的分析框架。社交网络、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都对政治参与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可能存在着社交网络的中介效应,个人的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等政治态度会作用于个人的社交网络,政治兴趣越高、政治效能感越强,越可能在社交网络中拓展相似的人群,从而影响政治参与行为。另外,政治兴趣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关系,两者互为因果。该解释框架可以解释线上参与行为和线下参与行为。

根据上述推理提出研究假设三和研究假设四。**研究假设三:社交网络在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存在着中介效应。研究假设四: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都可以使用图1的解释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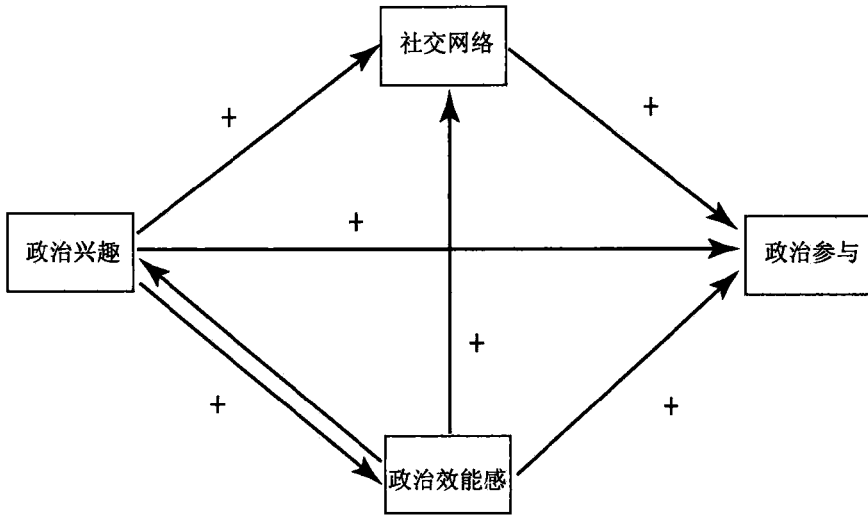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兴趣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

### 三、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笔者于2013年6月对浙江大学在校学生的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408个，考虑一系列因素，这在笔者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全体浙江大学学生为总体，剔除在职学生和留学生，抽样框为浙江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虽然这样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样本，特别是家住杭州或租住在外的学生，但在难以获取学生清单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该方法能够最大限度接近真实情况，笔者前期统计的浙江大学各校区宿舍数如表1。按每幢楼的宿舍数排序，进行等距抽样，最终抽中宿舍楼栋。

表1 浙江大学各校区宿舍数

校区	宿舍楼 (栋)	宿舍数 (间)
玉泉	35	4519
紫金港	48	6470
之江	5	217
西溪	14	1929
华家池	7	901
合计	109	14036

注：玉泉9舍、10舍的单元式住房，由于男女混住，1个单元按1栋计算。



之后每幢楼根据楼层数、每层宿舍数进行相应的抽样,综合考虑回收率等问题,最终确定的样本宿舍共140间。实地调查根据抽样的宿舍列表分组逐个进行,调查集中在晚上17:00-20:00,在玉泉校区,根据访员反映的研究生作息时间的特殊性,增加21:30-23:30时段,以提高应答率。每间宿舍进行3次调查,每次在列表中详细记录调查情况,以便之后再次调查。共回收问卷433份,剔除部分逻辑错误及大量缺失的问卷,剩余408份,问卷回收率为72.5%。可以满足在95%的置信水平,最大绝对误差小于5%的要求。

根据与2012年《浙江大学年鉴》提供信息的比较,笔者决定按照学历阶段和文理科进行加权,加权后的样本基本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类别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百分比
年龄		22.76	2.502	400	
网龄		7.56	3.099	396	
性别	男			273	67
	女			135	33
政治面貌	党员			176	44
	非党员			228	56
学科	理科			306	75
	文科			101	25
学历	本科			198	49
	研究生			208	51
居住地	城镇			257	65
	农村			140	35

## 主要变量的操作化

**微博使用:**受访者是否为微博用户,为定类变量,受访者中微博用户占70.6%,确实证明微博在大学生中的流行性。

**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就是“一般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sup>[17]</sup>。该界说对政治参与的概念分析有关键性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政治参与的操作化定义，只关注具体的行为。李亚好认为公民在网络中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程序性和非程序性行为则可称为网络政治参与。<sup>[18]</sup>青年大学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在校学习，并没有完全成为特定的社会角色，根据亨廷顿和李亚好的定义，并结合青年大学生的这种特定性，笔者各设计了6题以操作化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线下政治参与包括：我会参加学校、院系、班级组织的党团活动、我会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推选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或政协委员的推荐或投票、我会参与班级、年级、学生会或学校社团干部竞选、我会公开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观点、我会参加关于政治的讲座或演讲、我会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选项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采取以因子为基础的测度法（详见唐启明，2012），表3汇总了相关结果，信度系数为0.799。

表3 线下政治参与的因子分析结果摘要表

维度与项目	成分
线下政治参与	
我会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推选党代表、人大代表的选举或政协委员的推荐或投票	.766
我会参加学校、院系、班级组织的党团活动	.740
我会参与班级、年级、学生会或学校社团干部竞选	.728
我会参加关于政治的讲座或演讲	.671
我会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	.662
我会公开表达对公共事务的观点	.653
特征值	2.978
可解释的变量比例	49.6
阿尔法系数	.799

线上政治参与测量量表包括：我会关注时政信息、我会阅读与政治相关的幽默段子、我会观看与政治相关的视频、我会转发或评论政治信息、

我会参与热点时政的讨论、我会通过网络发表政策建议或进行网上信访，选项中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信度系数为0.839。

表4 线上政治参与的因子分析结果摘要表

维度与项目	成分
线下政治参与	
我会参与热点时政的讨论	.818
我会观看与政治相关的视频	.807
我会转发或评论政治信息	.779
我会阅读与政治相关的幽默段子	.735
我会关注时政信息	.700
我会通过网络发表政策建议或进行网上信访	.614
特征值	3.335
可解释的变量比例	56
阿尔法系数	.839

政治兴趣：采用2题，我对在政府部门里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很感兴趣，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信度系数为0.811。

政治效能感：人们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能力的评价被称为政治效能感。通过4题测量，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解政治事务、对各种社会事务我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去参与、我国的决策体制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政府部门/官员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部效能感和内部效能感，表5汇总了因子分析的结果。外部效能感信度系数为0.858，内部效能感信度系数为0.685。

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变量通过“您身边约有多少人可以和您讨论政治或社会事务？”和“在日常生活中，您通过互联网常联系的人？”两个问

表 5 政治效能感的因子分析结果摘要表

维度与项目	1	2
外部效能感		
政府部门/官员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	.927	
我国的决策体制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	.907	
内部效能感		
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政治事务		.910
对各种社会事务我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去参与		.789
特征值	2.275	1.033
可解释的变量比例	45	38
阿尔法系数	.858	.685

题分别测量讨论网和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测量题为多选，选中几种人，则相应记几分。

## 四、分析结果

表 6 汇总了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其中社交网络由于正偏严重，进行了自然对数转换。

线上政治参与与其他所有变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讨论组和外部效能感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为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条件。

为验证假设一，将社交网络、讨论网、政治兴趣、外部效能感和内部效能感纳入 OLS 模型，对于缺失数据的处理采用多重插补法。OLS 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7，线上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专业（文科生相比理科生更愿意进行线上政治参与）、讨论网、政治兴趣和外部效能感，需要指出的是社交网络和内部效能感对于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方向仍然是正向的，另外，系数的方向也表明男生更乐意进行线上政治参与。线下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更多，但也表明其预测更加困难，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讨论网、政治兴趣、外部效能感和内部效能感。

表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M	SD	1	2	3	4	5	6
社交网络	2.186	1.181						
讨论网	.856	.405	.179***					
政治兴趣	.598	.254	.079	.266***				
外部效能感	.524	.213	.100*	.240***	.494***			
内部效能感	.405	.247	.076	.059	.140***	.360***		
线上政治参与	.569	.211	.089	.398***	.657***	.499***	.203***	
线下政治参与	.525	.203	.088	.261***	.319***	.300***	.275***	.406***

注：\* $<0.05$ ，\*\* $<0.01$ ，\*\*\* $<0.001$ ，以下同。根据唐启明（2012）的建议，为避免题项方差大带来的各题权重不一的影响，每个题项先标准化后取均值再转化为0-1的值。

女生比男生更愿意在线下参与政治，但进一步使用t检验的结果表明，女生主要在参加党团活动、校内干部竞选和青年志愿者活动方面更积极，这可能是因为女生更易被动员有关，在公开表达观点和参加政治性讲座和演讲方面，男生更积极。年龄越大越少进行线下政治参与，党员更易参与线下政治，这些都与在学校里，女生更易被动员这一原因类似。从系数方向上可以发现，本科生、农村学生更乐意参与线下政治。根据表7的相关结果，假设一部分得到验证。

表7 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的OLS模型摘要表

自变量	因变量	
	线上政治参与	线下政治参与
性别（男=1）	0.023	-0.046*
	(0.016)	(0.019)
年龄	-0.001	-0.014*
	(0.005)	(0.006)

(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线上政治参与	线下政治参与
政治面貌 (党员 = 1)	-0.001 (0.017)	0.119*** (0.020)
专业 (理科 = 1)	-0.036* (0.017)	-0.003 (0.021)
年级 (本科 = 1)	0.008 (0.027)	0.058 (0.032)
居住地 (城镇 = 1)	0.001 (0.016)	-0.037 (0.019)
网龄	0.001 (0.003)	-0.002 (0.003)
社交网络	0.000 (0.006)	0.003 (0.007)
讨论网	0.115*** (0.019)	0.072** (0.023)
政治兴趣	0.405*** (0.034)	0.187*** (0.040)
外部效能感	0.162*** (0.042)	0.105* (0.050)
内部效能感	0.046 (0.032)	0.151*** (0.038)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在讨论组、社交网络、外部效能感、内部效能感、政治兴趣、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等变量上，微博用户与非微博用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 8 汇总了相关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微博用户与非微博用户在线上政治参与上存在显著差异，而线下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使用曼恩—惠特尼 *U* 检验探究微博用户与非微博用户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结果见表 9。

表8 是否为微博用户对于相关变量影响的差异检验结果摘要表

	是否微博用户	M	SD	<i>t</i>	<i>df</i>	<i>p</i>	<i>d</i>
社交网络	是	2.229	1.183	1.085	406	.279	0.116
	否	2.093	1.176				
讨论网	是	.877	.39177	1.584	406	.114	0.166
	否	.809	.43078				
政治兴趣	是	.607	.24868093	.972	406	.332	0.102
	否	.580	.26552247				
外部效能感	是	.534	.21603713	1.509	406	.132	0.162
	否	.500	.20497540				
内部效能感	是	.406	.24833249	.025	406	.980	0.003
	否	.405	.24530873				
线上政治参与	是	.585	.20607334	2.251	406	.025	0.237
	否	.535	.21959760				
线下政治参与	是	.527	.20042575	.223	406	.823	0.024
	否	.522	.20818930				

表9 是否为微博用户对于线上政治参与影响的差异检验结果摘要表

变量	是否微博用户	M	<i>U</i>	$\Sigma N$	<i>p</i>
我会关注时政信息	是	231.95	21203.0	458	.526
	否	223.77			
我会阅读与政治相关的幽默段子	是	234.97	19470.0	455	.071
	否	211.66			
我会观看与政治相关的视频	是	234.20	20257.0	457	.185
	否	216.86			
我会评论政治信息	是	245.25	16189.5	455	.000
	否	187.54			
我会参与热点时政的讨论	是	237.48	18767.0	455	.016
	否	205.99			
我会通过网络发表政策建议或进行网上信访	是	237.58	18634.5	455	.014
	否	205.52			

由表9可知，微博用户与非微博用户在线上政治参与上，差异均来源于web 2.0时代互动性的参与，而简单的信息参与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微博用户在所有题项均高于非微博用户。将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的因子值转化为1-100分，转化方法：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 \* A。其中， $A = 99 / (\text{因子最大值} - \text{因子最小值})$ ， $B = (1/A) - \text{因子最小值}$ 。B的公式亦为， $B = [(\text{因子值最大值} - \text{因子最小值}) / 99] - \text{因子值最小值}$  (边燕杰、李煜，2000)，个体线上政治参与 ( $M = 58.3$ ,  $SD = 21$ ) 高于个体的线下政治参与 ( $M = 52.6$ ,  $SD = 21$ )，笔者设计的线下政治参与量表已更多照顾青年大学生的特殊性，否则差距更大，假设二得到验证。

笔者使用Amos18.0进行模型设计与检验。由于社交网络变量成为了讨论网和社交网络，而政治效能感变为了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因此模型相应作了拓展，但保留了分析框架的主要结构。社交网络、讨论网、外部效能感、内部效能感、政治兴趣与线上政治参与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模型适配性良好 ( $\chi^2/df = 1.352$ ,  $p = 0.23 > 0.05$ ,  $RMSEA = 0.029$ ,  $CFI = 0.996$ )，路径系数均在95%的置信水平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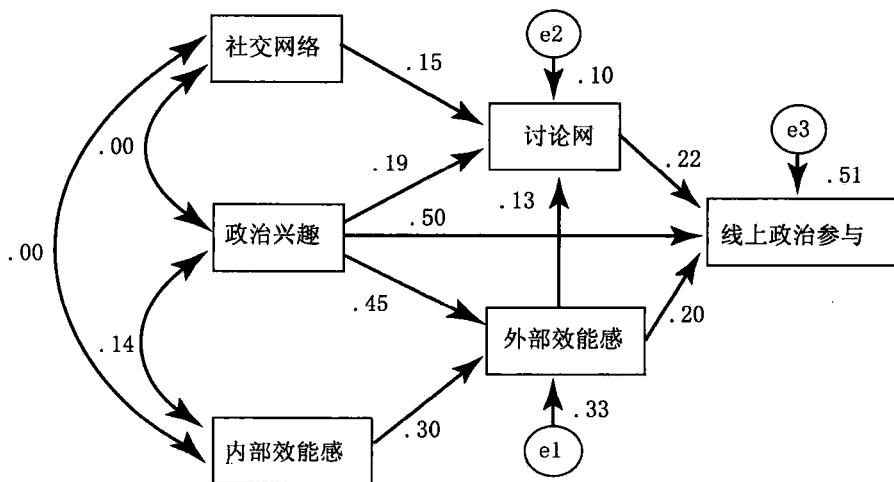


图2 线上政治参与的解释模型图



政治兴趣对线上政治参与有最大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50,并且讨论网和外部效能感具有中介影响,总效应 $=0.50 + 0.19 * 0.22 + 0.45 * 0.2$ ,为0.63。表10汇总了讨论网和外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表明两者中介效应均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为10%和17%。社交网络对讨论网有正向影响,对线上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为0.03,换句话说,个人社交网络的拓展需要纳入更多能真正进行相关深入讨论的个体,才会真正影响政治参与。内部效能感与政治兴趣相互影响,对外部效能感有正向作用,对线上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为0.07。该模型可以解释线上政治参与变量变异的51%。

表10 讨论网和外部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汇总表

编号	自变量	因变量	中介变量	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方差变异
1	政治兴趣	线上政治参与	讨论网	中介效应显著	10%
2	政治兴趣	线下政治参与	讨论网	中介效应显著	16%
3	政治兴趣	线上政治参与	外部效能感	中介效应显著	17%
4	政治兴趣	线下政治参与	外部效能感	中介效应显著	29%
5	内部效能感	线下政治参与	外部效能感	中介效应显著	30%

注:笔者直接采用Preacher(2004)设计的spssmaro脚本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图3展示了线下政治参与替换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中,外部效能感对线下政治参与的系数不显著,但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1.170$ ,  $p = 0.321 > 0.05$ ,  $RMESA = 0.020$ ,  $CFI = 0.997$ ),且好于删除该路径。与图2相比,主要变化在于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对线下均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增加了外部效能感对于内部效能感对线下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表10的汇总结果中,中介效应仍然全部显著。但对线下政治参与变量的总解释变异下降到19.2%。表10的结果验证了假设三,而假设四也在图2和图3中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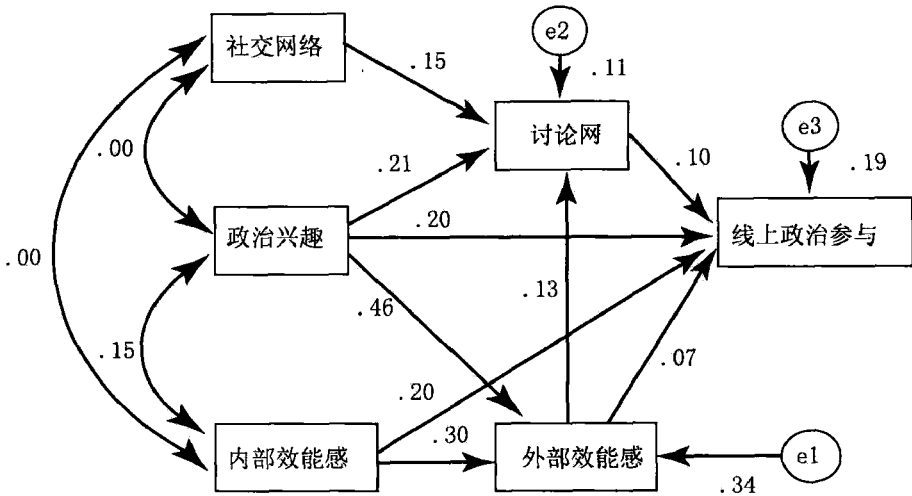


图3 线下政治参与的解释模型图

##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中，假设一和假设四部分得到验证，假设二和假设三得到验证。解释模型表明政治兴趣作为关键因素，直接、间接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帕特南的担忧不无正确，他强调的社会资本形成的机会对于政治参与的发展得到了验证，社会网络规模和异质性都会产生影响，政治参与的拓展依赖于微观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增强。对于线上政治参与，外部效能感作用更直接，而线下政治参与，内部效能感影响更大，现实的行动需要个体更自发的特质。笔者证明了目前青年大学生群体中线下政治参与、线上政治参与、微博政治参与的梯度上升关系，我们可以为部分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提供反对的证据，微博的使用有利于青年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拓展，其中微博使用主要提升了个体的互动性参与，更乐意表达。个体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本文的探索表明，政治兴趣是核心因素，社会网络和政治效能感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对政治更感兴趣的个体，更有可能调动社会网络和资源参与政治，在对线上政治参与的解释

中,该模型解释力是线下政治参与的2.66倍。

当然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多证据。要是基于浙江大学的调查所得的结论加以推广或推论,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浙江大学本身特性的影响,如更多的理工科色彩以及较高的男生比例。虽然进行了加权调整,但笔者使用的AMOS18.0并不支持加权处理,因此作用有限。模型的简洁要求限制了控制变量的加入。另外,更深入细致地探讨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形成过程的测量将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政治参与行为前个体的各种思考和选择,社会网络在此扮演的角色等,采用质性研究会有更多微观机制的发现。

#### 【注释】

- [1] 王明生:《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 [2] Norris P.,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Print on, 2000, p. 121.
- [3] Di Gennaro C., Dutton W.,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59, No. 2, 2006, pp. 299 – 313.
- [4] Schlozman K. L., Brady H. E.,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87.
- [5] Krueger B. S.,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source Approach”, i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0, No. 5, 2002, pp. 476 – 498.
- [6] Krueger B. S., “A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Interne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4, No. 6, 2006, pp. 759 – 776.
- [7] 陈强、徐晓林:《国外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述评》,载《情报杂志》,2012年第5期,第71—74页。
- [8]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4页。
- [9] 王传晓:《博客日志传播与人的后台行为前台化》,载《今传媒》,2006年第5

期,第56—57页。

- [10] Farrell H. ,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2012, pp. 35 – 52.
- [11] Polat R. K. ,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ploring the Explanatory Link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0, No. 4, 2005, pp. 435 – 459.
- [12] Negroponete N. , Sutherland E. , “Being Digital: The Roadmap for Survival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i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19, No. 7, 1995, p. 589.
- [13] [美]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燕继荣审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 [14] 张明新:《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9—57页。
- [15] Quintelier E. , Vissers S. ,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s for 16-year-olds in Belgium”, i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 26, No. 4, 2008, pp. 411 – 427.
- [16] Gil de Zúñiga H. , Jung N. , Valenzuela S. ,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3, 2012, pp. 319 – 336.
- [17] [美]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 [18] 李亚好:《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载《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第69—81页。

(本文作者季程远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治理、社区治理;郎友兴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et, especially the *weibo*, to some extent breaks

the logjam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annels in China. Against this backdrop, *weibo*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re is growing tendency in China that online protests are moving towards concrete social movements. So, studying *weibo*'s role in enabl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408 student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enabl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uthors also propose a model for stu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hich interests in politics is a strong factor whil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 network play the intermediary rol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is model applies both to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though its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latter is 2.66 times than that to the former.

##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ibo*; Mechanisms